

山西村治与

(1917 - 1927)



■ 董江爱 著

军阀政治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

山西村治与军阀政治

(1917—1927)

董江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村治与军阀政治 (1917—1927)/董江爱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2. 3

ISBN 7 - 80146 - 570 - 9

I. 山... II. 董... III. ①乡村 - 行政管理 - 政治制度 - 研究 - 山西省 - 1917—1927 ②军阀 - 关系 - 政治 - 研究 - 山西省 - 1917—1927 IV. D69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700 号

书 名: 山西村治与军阀政治

著 者: 董江爱

责任编辑: 尤永弘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8.5 印张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46 - 570 - 9 / D · 10

定 价: 18.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

一百年前，在欧风东渐、风雨如晦的清代末年，山西大学作为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诞生于北中国。从此，伴随着祖国发展的命运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山西大学不断发展壮大。世纪百年，沧海桑田。如今，山西大学已成为一所文、理、工、管、艺术、体育专业齐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展的、三晋大地唯一一所实力雄厚的综合大学。山西大学以其悠久的历史 and 百年来的快速发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自清末张之洞、杨深秀开办“令德堂”书院，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岑春煊创立山西大学堂，设中斋、西斋，并附设译书院，山西大学从创办伊始就体现着中西互补、弘扬学术的科学精神。承继山西大学百年传统的优良校风，为神圣的科学教育事业不懈奋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由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年来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集中筛选，辑作丛书，予以出版。我们把她作为一份生日礼物奉献给滋养我们成长的百年母校及所有校友。

愿山西大学在新世纪继往开来，再造辉煌。

山西大学校长 郭贵春

2001年3月

目 录

导论	1
一、本书的学术价值	1
二、以往中外研究的成果	3
三、研究旨要及研究路径	6
第一章 山西军阀政治的形成及村治思想的提出	14
一、清末民初山西农村社会的衰败	14
二、山西军阀政治的形成	37
三、山西军阀对农村社会控制的需求及村治思想的提出	43
第二章 村治思想	52
一、“用民政治”思想	52
二、“村本政治”思想	73
三、村治思想分析	88
第三章 村治组织与行为	102
一、村治组织的建立及其发展	102
二、农村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	110
三、村治行为	127
四、村治组织与行为特征	156
第四章 军阀首脑和村治领袖	164
一、军阀政权对农村控制的强化	164
二、村治对军阀政治的支撑	169
三、村治腐败和权力再失衡	180

第五章 山西村治在当时中国乡村改造运动中	
的地位和作用	190
一、山西村治与广西“乡治”的比较	191
二、山西村治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村自治”和 保甲制比较	200
三、山西村治与乡村建设派的乡村改良运动比较	209
四、山西村治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运动比较	220
附录 山西村治大事年记(1917—1927)	240
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63

导 论

一、本书的学术价值

山西村治是民国时期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的强化农村基层政治控制的活动,它是在自清末以来兴起的地方自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清末,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寻求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支持,曾倡行地方自治。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地方自治成为地方军阀求割自保的借口之一。阎锡山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实行村治的,其规模和声势居全国之首,以后又为其它各省所效仿。

阎锡山是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山西近代地方史上一个复杂的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他的政治活动对于近代中国特别是近代山西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村治是他统治山西时政治活动的重要方面,是其军阀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阎锡山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和段祺瑞历届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新军阀时代,统治山西 38 年之久,成为著名的“民国不倒翁”,不能说与其村政建设没有关系。在统治山西的 38 年中,阎锡山对村治作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在 1917—1927 年这十年间,他对村治倾注了大量心血,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村治思想体系,并力图在实践中实施。村治活动涉及山西农村的方方面面,对农村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理论上,阎锡山的村治思想是他的政治、经济和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上,控制农村是阎锡山维护其军阀统治的命脉所系。村治的内容包括与军阀政府利益直接相关的编查户、实行区村制、办理六政三事(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辮、种棉、造林、畜牧)、调解诉讼、执行村禁约、整理村范、办理保卫团、办理积谷等,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行政、司法、道德习俗等多个方面。所以,山西村治不论是对阎锡山这个政治人物来说,还是对山西地方史乃至民国史来说,都算得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但是,对于民国史上这颇为重要的一页,至今还鲜有人对此作过专题研究。以往研究阎锡山这个政治人物或山西地方史的学者,只是着重论述山西村治的制度设计和条文法令,或对村治的内容作一些总结性的评价,且这些评价多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或阶级色彩。所以,很有必要对山西村治作较为系统的研究。

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群龙无首,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在北洋军阀之外,又出现许多地方军事割据势力,他们拥兵自重,割地称雄,成为有权有势的地方军阀。由此全国形成了军阀混战、竞相争夺中央和各省政权的局面。军阀混战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央政府始终无法控制地方势力,军阀割据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在各派军阀都力图将势力渗透到农村社会的情况下,阎锡山第一个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把军阀政权渗透到村一级,并成为当时各派军阀中对农村社会控制最严密、控制时间最长的一个,研究山西军阀政治和民国以后山西农村权力结构、组织结构,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是很有帮助的。

山西村治是当时阎锡山在全国倡行地方自治的潮流中进行的,但它不同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自治,更不同于现代的村民自治。对山西村治的研究,也可以为现代的村民自治提供一些

得失的经验。

二、以往中外研究的成果

以往对山西村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角度：

一种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村治派以实地调查的方法对山西村治的研究。清末民初，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以及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都把农村作为统治的基础，企图通过农村治理稳固和强化其统治；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发动了一场农村大革命，试图在广大农村废除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也把关注的重点转向农村，他们走向基层，深入民间，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曾掀起一个研究村治的高潮，王鸿一、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专门研究村治，历史上称这些人为“村治派”，山西的赵戴文就是“村治派”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他们试图通过改造农村，实现国家的改造，达到国家的治理。这时山西村治已有十余年，且获“模范省”之称号，当然成为村治派关注的重点之一，王鸿一、茹春浦等人对山西村治作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村治派关于山西村治研究的资料却不多见，目前能看到的只有茹春浦的《山西村治之实地调查》、梁漱溟的《北游所见纪略》以及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关于山西村治的调查书，另有少许文章有零星记载。

从现有资料的分析来看，村治派对山西村治的研究，只限于阎锡山所实行的“村本政治”。他们除了不同程度肯定村治对山西社会稳定的作用之外，在许多问题上各持己见，评价不一。如茹春浦的《山西村治之实地调查》，认为山西村治为地方自治之中心，是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惟一方法。“山西在北伐战争中，仅十余月以一省之力，抗数十万之敌，而地方未靡乱者，亦以全省有村治组织，

便于运输与军需之供给,兵士之补充,颇有全省总动员故也。”^①显然,他只注意到山西村治中“村本政治”的表面现象。

王鸿一与茹春浦有同感。1922年,王鸿一到山西拜访阎锡山和赵戴文,觉得他们提出的方案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认为阎锡山的“村本政治”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并根据他在山西的所见所闻,开始把村落自治政府看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②

梁漱溟也肯定了山西村治在稳定社会方面的成绩。他在1929年考察晋省时发表的演说中说:“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别的地方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都保不住,还讲什么别的权力!”他还总结出山西村治的几大好处,如治安好,识字人多,禁烟有几分成功,天足有七八分成功,军事时期办理征发之方便等。但他对山西村治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山西村治的实际情况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从整体而言是失败了,其失败原因可以说它是纯由上用力往下推,而不明白社会是非靠自力自动不行的一点。他力只能用以引发自力,不能完全依靠,如果完全依靠他力,结果必归失败。”^③而山西的村治“全无引人民自动的好方法”,“政府办理村政督促提携太重,太多防制,太多助长”。^④在梁漱溟看来,阎锡山实行的村治是劳民伤财,特别是1927年后山西的自治体系堕落为东方化的专制主义官僚政体,它只是从形式上把权力简单地下放到基层。^⑤应该

① 茹春浦:《山西村治之实地调查》,《村治的理论与实践》,村治月刊社,1929年版,第54—57页。

②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③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5页。

④ 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村治》月刊,第1卷第4期。

⑤ 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村治的理论与实践》第3部《调查》,村治月刊社,1929年版,第25—27页。

说梁对山西村治提出的严肃批评是较为中肯的。

此外,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对山西村治的调查书则着重叙述了山西村治的制度设计和条文法令。

另一种是 50 年代以来的史学研究角度。有一部分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主要通过人物传记的形式对阎锡山进行研究(台湾学者早一些,大陆学者主要在 80 年代以后)。这些人物传记通常没有把村治作为关注的重点,也缺乏从政治学角度切入的视角,一般是从历史的角度,叙述山西村治的条文法令,或对村治内容作一些总结性的评价。一些著作由于史实、案例引证不足,特别是对村治的实际运作过程考察较少,判断上多带有主观性,以至表现出较浓厚的感情色彩。

在台湾方面,吴文蔚著《阎锡山传》、乔希章著《阎锡山》等只用很少的篇幅提及村治,有的仅以寥寥数语对村治作总结,即使是数百万字的资料丛书《阎锡山传记资料》,有关村治方面的资料也很少,且这些著作和资料大多为阎锡山歌功颂德,对阎的村治持简单的肯定态度。对山西村治叙述较多的是曾华壁著《民国初期的阎锡山》(1917—1927),作者在最后一章“建设状况”中,分政治建设(用民政治)、军事建设、教育建设(国民教育)、经济建设(农工商矿)、社会建设(村本政治)等几个部分论述了阎锡山的村治思想及实施状况。作者依据的主要是阎锡山言论类编的资料,许多论述不合乎历史事实。但此著引用了不少阎锡山档案资料,为我们研究山西村治提供了一些宝贵资料。

在大陆方面,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编写的《阎锡山评传》、山西文史资料室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及蒋顺兴、李良玉主编《山西王阎锡山》等,这些人物传记大都没有对村治方面的内容进行系统论述,只是作了一些总结,而且有的是针对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军阀本质,对村治持否定态度,也有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李茂盛等著《阎锡山全传》一书,对阎锡山复杂多变的一生,

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对村治的内容涉及较多,且引用了许多数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此著重在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叙述村的编制及各项村政的条文法令和村治效果,但对实际操作过程的勾画分析较少。

第三种是从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角度,对山西村治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其中较为精细的是美国唐纳德·G·季林著《阎锡山研究》。他主要对当时山西农村改造的条件和结果进行分析,在肯定部分成绩的同时,认为山西村治基本上是失败的。他的分析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其中一些观点以及从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角度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以后的山西村治研究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但他只是对山西村治的某些方面进行了论证分析,而没有对村治进行系统研究,且因史实、案例引证不足及观念上的原因,一些问题的评论或结论值得商榷。

尽管如此,以往研究阎锡山的专家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山西村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做了较细致深入的研究,为此后研究山西村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线索、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这些现有的成果为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本书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阎锡山村治思想的社会政治背景、理论渊源、基本制度、结构功能以及社会影响等作较为系统的研究。

三、研究旨要及研究路径

笔者认为,阎锡山当时的军事力量弱于北洋各派系以及其他实力较强的地方军阀,要想生存,必须从激烈的军阀混战中退出来,在山西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地盘,以壮大军事实力。阎锡山实行村治的目的就是把山西作为其军阀统治的基地,在内部实行严密的社会控制,尽山西的地力和人力强化其军事实力。换句话说,满足军阀政治的需要正是阎锡山村治思想和村治行为的出发点。因此,关注军阀政治的需求,乃是本书研究思路的

基点所在。

本书旨在探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山西村治的理论及其实践,试图阐明:在军阀混战时代,山西军阀阎锡山对外执行“中立”和“不介入”政策,对内专注于农村社会改造的历史必然性;阎锡山是如何通过村治强化农村基层政治控制的;军阀政府的权力和法令是如何在农村贯彻执行的;村治是如何维系军阀统治的,维系到什么程度,等等一系列问题。并从表面上的非线性关系中,力所能及地找出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本书所论述的山西村治,是指阎锡山军阀政府通过以地主士绅为主导的区、村两级(主要是村级)行政机构强化农村基层控制和开发农村资源思想和活动,阎锡山将其称为“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内容涉及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行政、司法、道德习俗等各个方面。除导论外,本书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章阎锡山军阀政治的形成及其村治思想的提出。主要论述阎锡山村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清末民初的山西农村,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封建掠夺和自然灾害的打击,经济、政治状况严重恶化。经济上,农业凋敝,农村手工业户破产,农民失去土地,流落他乡,农村经济严重衰败。政治上,基层行政区划混乱,里甲、保甲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国家政治控制减弱。农村经济衰败和政治控制减弱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农村社会秩序的崩溃。阎锡山军阀政治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军阀需要依靠农村发展其实力,所以,重建农村秩序,开发农村资源,实现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成为阎锡山军阀政府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阎锡山的村治思想就是针对当时山西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军阀政治的需求而提出来的。

第二章村治思想。阎锡山的村治思想是他整顿山西的根本依

据。本章着重论述阎锡山“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的思想内涵以及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并总结出阎锡山村治思想的特征。

阎锡山的村治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包括“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用民政治”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村本政治”产生的前提,“村本政治”又是“用民政治”的补充、改进和发展,其最终目的还在于“用民”。

在“用民政治”设计中,阎锡山效仿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模式,通过加密和下沉行政网,推行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六政三事”和以灌输儒家思想及军国主义思想为主的国民教育,其目的在于将农村社会的各种资源置于军阀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在“村本政治”设计中,阎锡山由发展经济转向整顿农村社会,其核心在于将基层政权下沉到村一级,并把西方的地方自治思想和孙中山提倡的民治主义移植到军阀极权主义建构中,实行“以村为本”的政治建构和政治管理。村治思想最明显的特征是军国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结合,一方面利用军国主义统治方式“看住”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剥夺社会自由;另一方面通过儒家“王道”和“人心”的道德教化变外在的“看住”为内在的自觉自律。

第三章村治组织与行为。村治组织与行为是阎锡山村治思想在实践中的贯彻执行。本章着重论述村治组织体制的建立和绅权在区村两级行政系统的确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村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勾画村治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实施状况。在此基础上,对村治组织与行为嬗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总结出村治组织与行为的特征。

在村治思想实施之初,阎锡山效仿日本的市町村制,以自然村为基础编制行政村,并在县以下的农村基层社会设立区、村两级行政机构。经过五年的实践和改进,在村一级形成了村——间——邻三级管理体制,同时,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严密的行政统治网络,使军阀政府的权力不仅延伸到村,而且渗透到以五户为单位的

邻,最大程度地强化了军阀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阎锡山军阀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是依靠地主士绅实现的,所以,在基层政权的权力分配中,阎锡山采取了文化程度、财产限定和县知事择委相结合的办法,把区级和村级政权都交给了原本就掌握农村资源的地主士绅。地主士绅的权力在许多方面得到拓展,农村政治权力关系因此发生了变化。

阎锡山在“六政三事”、国民教育、整理村范、村政建设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际操作与阎锡山的理论设计还相差甚远。比较而言,在全省范围内,“用民政治”设计比“村本政治”设计贯彻的要好一些。村治思想在实行的过程中,表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1)官办组织与政府行为;(2)地方警察化、军事化;(3)农村基层统治的高度复杂性和个人专制性。

第四章军阀首脑和村治领袖。本章着重论述军阀政治从村治中获得的利益及为之付出的代价,主要分析军阀政府通过村治领袖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和村治对军阀政治的支撑,以及村治思想内在逻辑导致的村治腐败和权力再失衡。

阎锡山军阀政府是山西惟一实行政治、经济及社会治理的合法政府和权力分配机构。政治上,阎锡山通过村治在山西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政治机构,从上到下,由内而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指挥系统,阎锡山位于塔顶,指挥一切。经济上,军阀政府广泛参与农村经济活动,控制农村经济命脉,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个体农民的超常榨取。在意识形态方面,阎锡山在以行政警察手段直接监视人们行为的同时,又通过改良社会风俗、实行强迫教育、掌握舆论工具等手段,控制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山西村治为晋系军阀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为军阀统治积累了较雄厚的资源,使山西军阀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年代,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具备了向强大军阀发动战争的实力。同时,村治的实施客观上对山西的

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阎锡山是代表地主士绅利益的军阀首脑,他不可能从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关系入手来解决农村破败的问题,这本身就决定了村治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再加上村治思想内在的逻辑矛盾,致使村治连阎锡山所设想的狭隘利益也很难实现。一方面,基层官员权力的膨胀是村治思想自身逻辑的必然结果。阎锡山是通过加密和下沉行政网的办法,依靠地主士绅控制农村社会的,结果使官僚机构进入不断膨胀的恶性循环中,造成官僚腐败。另一方面,阎锡山把军阀政府的政治体系延伸到基层农村,强化了军阀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在许多方面触动了地主士绅的利益,这些有损于地主士绅利益的政策很难在农村社会推行,最终导致了军阀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和资源提取能力下降。

第五章山西村治在当时农村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章主要通过山西村治与广西桂系军阀的“乡治”、国民党新军阀的“乡村自治”和保甲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运动等的比较,论证当时中国农村的出路。

国民党的“乡村自治”和保甲制无任何成绩可言。山西的村治和广西的“乡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一些成绩,并由此成为轰动一时的“模范省”,但他们的成绩只是将农村管住了,使政府的控制得到加强,或者通过农村改造运动强化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达到了某些急功近利的目的,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破败的问题,更谈不上农村建设。

梁漱溟作为一名关心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从事“乡村建设”不像军阀那样带有急功近利的目的,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全盘考虑和各地农村改革运动调查的基础之上,包含着对乡村建设的整体设计。但是,梁漱溟不懂得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矛盾,而且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也缺乏正确认识,这就决定了梁漱溟

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不现实性,因而必然会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的途径解决农村破败的问题,其失败是不言而喻的。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说明,在中国要想把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起来,必须首先关心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问题,否则,再高明的理想设计都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政策与山西军阀、广西军阀以及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乡村建设运动有许多相类似或者说共同的地方,但不同的是军阀依靠的是在乡村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地主乡绅,而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依靠的是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农民都获得了翻身解放。所以,共产党能够在更为困难的环境中情况下,既缺乏政治权力、又缺乏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的,成功地把最广大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参与政治、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在广阔的农村建立起基层政权和巩固的根据地,进而依靠农村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终战胜敌人,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历史事实证明,国民党蒋介石代表中国社会最黑暗最反动的势力,桂系军阀和山西军阀虽以“进步”和“开明”的面目出现,但他们都是剥削阶级利益的代表,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但不可能拯救农村,而且最终会把破败的农村推向更加痛苦的深渊。梁漱溟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试图在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不改变剥削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良乡村的办法拯救农村,也是行不通的。只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从解决农民迫切需要的土地入手,把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把最广大的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黑暗统治,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破败问题。

本书试图以政治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主,并吸纳社